

雙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

——評杜應國〈關於托洛茨基及其評價問題〉

◎ 施用勤

一 前言

在革命史上，托洛茨基無疑是最具悲劇性的人物了。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和斯大林以後的蘇聯以及後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當成反革命來醜化。雖然人類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托洛茨基去世已經大半個世紀，把他打成反革命並對他進行種種誣衊和詛咒的斯大林去世也半個多世紀了，但當年對托洛茨基的誣陷和詛咒仍有跡可尋。如中國當前高中使用的《世界歷史》教科書中，仍說托洛茨基在列寧病重和逝世後向黨發動進攻，搞分裂黨的派別活動，斯大林與他鬥爭是捍衛列寧主義，捍衛黨的統一。在東歐易幟，蘇聯解體之後，知識份子紛紛打出「告別革命」、「人間正道私有化」的旗號時，托洛茨基又被重新歸入革命家的行列，但不是為了讓他進入革命的先賢祠，而是為了他的「革命罪行」把他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在蘇聯解體之前，即在1991年夏天，筆者在參觀一個著名俄國莊園時，在一個展廳裏就看到一個掛盤，盤上畫的是俄羅斯神話故事中長著七個頭的妖龍，這七個頭分別是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在革命的聲譽已經被斯大林及其體制敗壞殆盡時，人們懶得辨別真正的革命家和「革命官僚」之間的區別，於是，曾經彼此進行了將近二十年殊死鬥爭的「革命騎士」托洛茨基與「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語）」斯大林又被重新歸在一起。

在80年代末，斯大林體制已經陷入絕境，因積重難返而改革的前景渺茫時，這種情況就已經很明顯了。拿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為例。此人是歷史、哲學博士、上將，曾任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因建議用資訊—社會保障機構取代軍隊政治機構而被免除職務，降職為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他最著名的著作是「領袖三部曲」：《斯大林政治肖像》、《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列寧政治肖像》。除《斯大林政治肖像》已經在中國翻譯出版外，其他兩部都還沒有中譯本。在三部曲中，《斯大林政治肖像》於80年代末最先問世，在這本書中，作者仍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揭露斯大林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罪行，號召回到列寧那裏。這與當時戈巴契夫的改革是一致的。在這本書中，對托洛茨基的描繪雖然沒有完全重複斯大林時代的詛咒，但基本上是否定的，如野心家、虛榮心極強、只會誇誇其談，強烈的權力欲導致他在列寧病重和逝世後進行派別活動，妄圖篡黨奪權，最後身敗名裂，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發洩他對斯大林的仇恨等等。作者之所以這樣描寫，或是由於他那時還沒有閱讀托洛茨基所寫的大量文章和信件，或是由於當時蘇聯的環境還不允許他以另一種方式談這位元革命領袖，因為蘇聯當局還沒有為他平反。在他寫作於1992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時，他顯然已經閱讀了大量有關托洛茨基的材料和他本人的著作與文章。他在該書的前言中說：「我認為，伊薩克·多伊徹的巨著《先知三部曲》是這位俄國革命家的最客

觀的傳記。」了解他本人當時對革命的態度，他的這個評價就更為可貴。此時的沃爾科戈諾夫的觀點已經和他當初寫《斯大林政治肖像》時大不一樣了，這時他已經開始否定革命了，但與他此後寫《列寧政治肖像》時還有距離，在那本書裏，他把列寧描繪成陰謀家、野心家、權術家，性格殘忍、冷酷，比斯大林有過之無不及。在《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中，托洛茨基不再是《斯大林政治肖像》中的政治小丑，作者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個人才幹，但整體仍是否定的，稱他為「革命狂人」。由於誤入革命歧途，而且還是「狂人」，故而他那超人的精力、非凡的才幹給國家、人民乃至他本人都帶來了災難。

記得1997年，在《博覽群書》雜誌上曾讀到某著名學者為沃爾科戈諾夫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寫的一篇書評。但該書評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其實仍是沃氏在《斯大林政治肖像》中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即政治小丑、野心家、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對手等等，其中完全看不到沃爾科戈諾夫對革命和托洛茨基看法的轉變。其實，沃氏對托洛茨基評價的改變從他作為卷首語所引的別爾嘉耶夫的話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不算列寧的話，托洛茨基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高好幾頭。這是無可爭議的。當然，列寧更偉大、有力，而托洛茨基更才氣橫溢、更出類拔萃……。」

在俄國，沃爾科戈諾夫的觀點不是偶然的，是有代表性的。至此，托洛茨基經歷了雙重的歪曲，已經面目全非了。第一次歪曲是在革命的旗號下，而且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歪曲無所不用其極，他的著作被嚴厲禁止，閱讀、傳播托洛茨基的著作按反革命論處，被判處死刑、流放，最輕的也要被監禁幾年。由此而造成的民眾對托洛茨基的曲解是高壓和無知的產物。但只要人們依舊信仰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對他的魔咒遲早會解除，人們遲早會通過閱讀歷史重新認識這位元革命家和歷史人物，閱讀他的著作，對那段歷史和托洛茨基本人重新評價，並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學習對形勢進行革命分析的方法，從中汲取對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勇氣和智慧。

然而，由於建立在高壓和集權基礎上的斯大林體制一直打著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旗號，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作法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造成了嚴重的危害。被剝奪了獨立思考權利的民眾和知識份子很容易把對斯大林體制的不滿變成對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不滿。這也有情有可原。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有更高的生產力，人們應該享有真正的、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加合理。但在斯大林和斯大林式的官僚的統治下，所有這些都只是停留在宣傳上的東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是夜郎自大的誇誇其談，人們對領袖和制度的擁護是欺騙和員警手段的結果。這種情況在蘇聯延續了六十多年。制度的僵化日益嚴重，人民群眾的不滿愈來愈強烈。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放鬆了壓力，原來的制度就難以維持，連對它進行激進改革的機會都沒有了。這也是戈巴契夫改革失敗的原因之一。把赫魯雪夫的改革與戈巴契夫的改革進行對比，就很清楚。1956年開始的對斯大林的否定是回到列寧那裏（當然，赫魯雪夫沒有也不可能回到列寧那裏），而戈巴契夫對體制的改革，其結果只能是倒退回資本主義。這種急劇的變化使社會喪失了重新梳理革命，把斯大林官僚毒瘤從社會主義機體上切除的歷史機會。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被否定之後，革命巨人、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領袖、無產階級專政的奠基人還能恢復他的歷史本來面目嗎？稱他為「革命狂人」已經是很客氣的了。由此形成了對托洛茨基的第二次歪曲，這次歪曲是對斯大林式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反感以及對托洛茨基同樣的無知的產物。從某種角度說，第二次歪曲比第一次歪曲更嚴重。它完全剝奪了人們對革命的興趣，而代之以鄙薄和厭惡之情，這樣，作為革命最傑出的代表和領袖的托洛茨基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難怪杜應國先生對杜建國先生研究托洛茨基不以為然了，他以不屑的口吻說，居然現在還有人對托洛茨基感興趣。

托洛茨基在中國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在改革開放前，他的著作一直是禁書，「託派分子」的罪名曾使許多原本與「託派」不沾邊的共產黨員死於非命，其中較有名的是王實味，後來在給他平反時又鄭重其事地給他摘去這頂帽子；在抗日戰爭期間，除了「反黨」之外，又給他們扣上了「漢奸」的罪名，「託派分子」真是十惡不赦。1952年，國內託派分子被一網打盡。魯迅研究界頗有名氣的李何林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托派分子」時總是義憤填膺，以「托匪」相稱。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對托洛茨基的研究和重新認識是不可能的。不算解放前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解放後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共有五至六種，其中包括《我的生平》、《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被叛賣的革命》等，均屬於「灰皮書」系列，即「內部讀物」，不公開發行，夠一定級別的領導和專業研究人士才能購買閱讀。甚至在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情況也沒有多大改變。記得在《好書》雜誌評選1999年十大好書時，評委之一的中共理論家龔育之先生說，《先知三部曲》是一部有份量的學術著作，但要把它評為好書，就要涉及對托洛茨基的重新評價問題，還是不評為好。改革二十多年來，托洛茨基著作及有關他的研究著作的出版極為有限。在此期間新出版的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有《流亡日記》，另外，《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文學與革命》從內部讀物變成公開出版物。但這只是托洛茨基著作中極小的一部分。據國外專家統計，托洛茨基著作全部出版的話，可達150多卷。80年代，出版過一部李顯榮的研究專著《托洛茨基評傳》，此書除了恢復了一些史實——如托洛茨基直接領導了十月革命，他是紅軍的締造者和總司令——外，對他的評價基本仍停留在斯大林時代。確實，如今在中國托洛茨基著作不再是禁書，研究和出版托洛茨基著作也不再是違禁之事。國內目前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現狀只能從改革開放之後知識份子向右轉、對左深惡痛絕中去找，在「告別革命」、「人間正道私有化」的口號下，還會對托洛茨基感興趣嗎？

不僅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譯本出版情況不佳，國內圖書館連一套完整的托洛茨基原文著作都沒有。筆者自翻譯校對完《先知三部曲》之後，對托洛茨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去國家圖書館和中央編譯局圖書館查找托洛茨基的原文著作。本以為在這兩家圖書館中即使不能找到他的全部俄文著作，起碼也能找到一大半。結果大失所望。在中央編譯局圖書館中，托洛茨基的俄文著作只有四十多部。即使是1927年以前蘇聯出版的二十一卷《托洛茨基全集》（其中不少是兩冊一卷）也不全，只有十幾本，而且都是影印本，有幾本複印得模糊不清，難以分辨。國際共運專業圖書館的情況都這樣，其他圖書館的情況可想而知。

杜應國先生稱，如今對托洛茨基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的障礙已不復存在。從理論上講，確實如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以公開出版，對他的研究也不再是禁區。但根據甚麼？根據斯大林對他的誣蔑？還是根據如今向右轉的知識份子對革命史的新的曲解？還是根據國內已經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十五份之一？還是根據已經基本出齊的英文版托洛茨基著作？

二 杜應國先生對托洛茨基的曲解

儘管杜應國先生自認為與國際學界共識接軌，擺出一副師爺訓人的架勢，但在他的文章中卻看不到他讀過多少托洛茨基著作或對托洛茨基思想以及當年黨內鬥爭的歷史完整把握的痕跡，而雙重的曲解和無知卻不少。下面將擇其要者進行分析。

作者認為，托洛茨基雖然最早提出新經濟政策，但他沒有意識到和平建設時期已經來臨，清醒地意識到這點的只有列寧。關於列寧制定新經濟政策的歷史背景及目的，在拙文〈誤讀的歷史，破產的經濟模式〉²一文中已經做了剖析，這裏不再詳述。僅限於指出，列寧的新經濟

政策是在喀琅施塔得紅色海軍基地暴動的壓力下制定的，而且他從新經濟政策伊始就提出誰戰勝誰的問題，即資本主義因素戰勝社會主義因素，還是社會主義因素戰勝資本主義因素的問題。看來，在列寧的詮釋下，新經濟政策下的經濟建設根本不是甚麼和平建設，而是充滿了鬥爭的建設；更何況列寧終其一生都是世界革命的堅定信奉者，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框架內才能解決。把他的新經濟政策與後來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經濟政策混為一談，並把它與托洛茨基的工業化、集體化政策對立起來，是對列寧和他的新經濟政策的極大的曲解。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惟一模式的說法，完全是布哈林的觀點，而不是列寧的觀點。雖然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要「認真地、長期地推行」，只要指出列寧所謂的長期僅僅是五或十年³。讀者就可以看出列寧與布哈林的區別了，從而也可以看出杜應國先生的斷言是沒有憑據的。

托洛茨基主張「擰緊螺母」、「整肅工會」、「工會國家機構化」是實有其事，並非作者有意歪曲。只是作者沒有交待清楚其歷史背景，其結果仍是在歪曲。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早在20年初，托洛茨基就意識到俄國經濟形勢嚴重，有可能對革命政權造成致命的威脅。因此他提出以實物稅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旨在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中央委員會以十一票對四票否決了他的建議。他主張的新經濟政策被否決了，而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又刻不容緩，他只能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尋找出路，即「正確地、系統地實行戰時方法，以求得實際經濟成果」。而當時的工會組織（從中央到地方）並不理解經濟問題的嚴重性，極大地妨礙著經濟建設的有序進行。托洛茨基採取的「擰緊螺母」、「整肅工會」、「工會國家機構化」的措施只能說是不得以而為之，或者說在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人中，他最早意識到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與列寧當時在工會問題上的分歧，是由於「列寧準確無誤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這個危機時刻（指廣大工人群眾不能忍受戰時的命令方式——本文作者）的來臨」，而托洛茨基則「完全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在戰時共產主義的基礎上讓工會做出進一步的努力」，旨在解決「糊口之糧和工業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緩的問題」⁴。這兩種考慮在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下，只能各執一端，顧此失彼。因而不能說列寧的考慮是正確的，托洛茨基的考慮是錯誤的，反之亦然。沒有糊口之糧、工業燃料、原料，光考慮政治不行，不考慮政治，單單考慮糧食、燃料和原料也同樣不行。聯繫到托洛茨基是在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建議被否決後才不得以求其次，就更沒有理由說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獨裁者的嘴臉，若是他在權力角逐中獲勝，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獨裁者。新經濟政策兼顧了這兩種考慮，消除了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列寧起草了幾個關於轉入新經濟政策的非常謹慎的提綱，我立即站到了他的一邊……幾個月後，列寧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個有關工會的作用和任務的全新的規定。我完全贊同他的決議案，於是我們之間又恢復了團結一致。」⁵至於「工會國家機構化」，托洛茨基本人是這樣說的：「在戰時共產主義制度中，所有物資至少在原則上都國有化，並根據國家命令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其中有工會獨立作用的餘地。既然工業生產是有賴於國家保證工人得到必需的產品，那麼工會應該被納入國家工業管理系統和產品分配系統之內。工會國家機構化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此，而且是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的必然產物。」⁶說得夠清楚的吧。

如果真像杜應國先生所說的那樣，列寧意識到和平建設時期已經來臨，而托洛茨基的經濟政策與列寧的背道而馳，那麼杜先生又如何解釋列寧在其「遺囑」中在經濟、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邊呢？

杜應國先生認為托洛茨基在派別鬥爭中「屢戰屢敗，但屢敗屢戰」，可嘉的似乎只是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但也有些堂吉訶德的味道。事實究竟如何？

記得一次我與朋友聊起聯共（布）20年代黨內鬥爭，我說在這場鬥爭中，斯大林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朋友吃驚地說，不對，斯大林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對派。我對他說，你說的是政治鬥爭的一個方面，即權力鬥爭的結果，而我說的是政治鬥爭的另一方面，即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鬥爭的結果。單純從誰贏得權力，搞垮了對手來說，斯大林是大贏家，但從思想觀點、方針政策的鬥爭來說，贏家就不是他了，而是托洛茨基。一般來說，政治鬥爭的這兩方面的結果應該是統一的，即使有背離，也是暫時的。在黨員和民眾還無法分辨方針政策、路線的對錯時，錯誤的一方可能獲得勝利，正確的一方可能暫時失利。一旦實踐做出了裁決之後，廣大黨員和民眾為了黨和國家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會回過頭來支持正確的一方。然而在布爾什維克黨內、蘇維埃俄國中，在列寧病重和逝世後的特殊條件下，政治鬥爭的這兩個方面出現了長期嚴重的背離。

這一切是怎麼形成的呢？

在列寧領導時期，黨內不同觀點之間的鬥爭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本來是很正常的事。遠的不說，自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到1923年初列寧徹底失去理政能力之間，黨內鬥爭曾發生過多次。如二月革命後，主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與堅持「工農民主專政」的以斯大林、加米涅夫為代表的黨的上層領導發生爭論⁷；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寧與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代表的右派在是否進行武裝起義的問題上爆發了激烈的衝突；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期間，黨內主和派與主戰的左派共產黨人的嚴重分歧；內戰期間，中央軍事路線與軍事反對派的鬥爭；在恢復經濟建設時期爆發的工會辯論；列寧晚年在外貿壟斷制和民族問題上與三駕馬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激烈鬥爭⁸。

然而那時的鬥爭，是同志之間不同觀點和意見之間的鬥爭，鬥爭的手段是公開辯論，贏得多數者獲勝，充分體現了黨內民主。除了最後兩場鬥爭——即有關外貿壟斷制和民族問題的鬥爭——之外，沒有一次鬥爭曾導致人事變動，就連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洩露起義日期，也不例外。

然而，列寧生病和不能理政之後，布爾什維克這一黨內鬥爭的良好傳統被破壞了。黨內鬥爭主要不再是因為對方針政策的觀點分歧，而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目的的變化使鬥爭的形式、手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開始時的目的就是要把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備受詛咒的托洛茨基排擠出權力核心。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變化呢？

1902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該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開始時，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維克一邊，後來，他脫離孟什維克，為黨的統一而鬥爭，因此與布爾什維克衝突不斷，他與列寧多次論戰，彼此攻擊。他於1917年5月加入布爾什維克。由於他傑出的組織和宣傳鼓動才能，他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在內戰開始後，他出任軍事人民委員、最高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締造了紅軍，並率領這支隊伍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內戰結束後，飽經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和內戰破壞的俄羅斯滿目瘡痍、一片凋敝，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尤其是工業的動脈——鐵路運輸——已瀕臨癱瘓。又是托洛茨基兼任起鐵路人民委員之職，在短期內修復了大量機車，使鐵路恢復正常運轉。因此，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地位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也因此被列寧譽為最能幹的兩位中央委員之一。

這在布爾什維克的上層領導中引起了不滿，尤其是季諾維也夫、斯大林這兩個野心勃勃的人。

但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在嚴酷的內戰時期，黨只能高度集權，最後幾乎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政治局。那時，布爾什維克黨主要為生存而鬥爭，無暇進行體制建設，當時所採取的措施都是應急性的，如權力高度集中、普遍的任命制等等。這些特殊的情況造成黨內產生了一批官僚，他們產生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大多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十月革命和內戰——沒有作為，因為他們不具備作為這場自下而上的革命的領袖人物的雄才大略、高瞻遠矚。但在革命後，他們身居要職，掌握了不小的權力，他們對長遠的革命目標失去興趣，對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變得愈來愈冷漠。他們熱衷於權術，更喜歡自上而下的傳統的統治，更願意享受革命已經給他們帶來的結果——權力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權。他們為了權力無原則地勾結起來，這種作法本身證明了他們的墮落。病中的列寧察覺了這一情況，他提議與托洛茨基結盟，反對官僚主義，並以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和吸收更多產業工人入黨來加強黨內民主，消除戰時高度集中所造成的弊端。⁹可惜為時已晚，他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其結果是使三駕馬車及其支持者更加緊密地勾結在一起。

三駕馬車正是利用列寧打算消除的那些弊端，鞏固加強自己的陣地的。開始時，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結盟——三駕馬車——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數，以便將托洛茨基排擠出權力中心。很快又由「三駕馬車」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¹⁰。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組」代表的是一批有實權的中央委員。1924年召開的八月全會期間，季諾維也夫等人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魯祖塔克、伏羅西洛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彼得羅夫斯基、古比雪夫、烏格拉諾夫等人，「七人小組」就是這次會議選出的執行機構，其候補人員有捷爾任斯基、加里甯、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伏龍芝。會議對新建的領導集體的活動制定了嚴格的章程，其中一條是嚴守紀律，即「七人小組」在內部調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對付托洛茨基。「七人小組」每星期二召開會議，政治局每星期四召開會議，以便提前協調立場。這樣一來，托洛茨基在黨的領導層中被完全孤立，用季諾維也夫的話說，他被「箍了起來」。「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當時的經濟、政治、對外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問題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最重要的決定，所有組織問題還有黨的幹部任免問題，幾乎全是「七人小組」事先決定好的。難怪季諾維也夫後來證明，「七人小組」是瞞著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實際領導，擁有專門密碼的真正的派別組織¹¹。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數後，他們便自稱是黨的領導核心，但這個核心不是在革命中形成的，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革命目標，也不是共同的立場和觀點，而是奪權的野心。黨在這樣的核心的控制下，逐漸從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退化成為少數野心家服務的馴服工具，這個所謂的核心在幾年之後就發生了分裂，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駕馬車」為了達到排擠托洛茨基的目的不擇手段，在開始時他們不敢直接與托洛茨基對抗，就借助神化列寧，再翻出十多年前列寧與托洛茨基論戰時的彼此攻擊來敗壞後者的名聲，並把自己裝扮成列寧的學生，並歪曲、誣陷說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後一直推行一條反列寧的孟什維主義路線；而他們這些在外貿壟斷制和民族問題等事關國家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公然與列寧對抗，為私利而背叛列寧遺願的人，卻無恥地把自己說成是列寧路線

的忠實捍衛者。領袖——列寧——永遠正確，黨內鬥爭是正確的領袖（列寧）和擁護他的學生（七人小組及其支持者）與反對他的人——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當然，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陸續淪為反對派後，他們就失去了列寧的學生的桂冠，成了列寧的兇惡的敵人；而斯大林的地位則進一步提高，當時的黨內鬥爭就成了他和列寧一起反對孟什維克、反革命和叛徒的鬥爭。這種對黨內鬥爭的曲解為後來斯大林的獨裁奠定了基礎，並對世界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請回憶一下文革中對所謂黨內路線鬥爭的詮釋。

即使這樣，他們對戰勝托洛茨基仍沒有把握。他們還需徹底破壞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並利用斯大林手中掌握的組織局和各層書記隊伍，對廣大黨員和工人群眾進行威脅利誘：反對托洛茨基者就能提升，不反對他的甚至不能當廠長、車間主任、會計乃至繕寫員。以此把革命領袖與廣大群眾隔離開來。十月革命本來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導人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勝利後始終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他們不斷向群眾發表演說，用革命的理想和目標鼓舞人民，讓人民了解當前的任務和困難，在教育鼓舞人民的同時，他們也能親身感受到人民群眾的情緒和要求，以及他們對黨的方針政策擁護與否。他們不僅在群眾大會上講話，還深入到工廠兵營演講。列寧就是在工廠演講時遇刺的。演講更是托洛茨基的主要鬥爭武器，正是他那雄辯、充滿激情的演講使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傾向革命，保證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倉促組織起來的工農紅軍成為一支戰無不勝、所向披靡的英雄隊伍。而後來多數派之所以能戰勝他，靠的是限制他的觀點的傳播，把這位革命的泰坦神與賦予他不竭的力量源泉的大地——人民群眾——隔絕開來。

就是上述情況造成了聯共（布）當年黨內政治鬥爭中權力鬥爭結果與思想、方針政策鬥爭的結果長期嚴重背離的原因。

無原則的勾結和陰謀手段只能保證斯大林攝取權力，卻不能保證他運用權力的能力。這就是斯大林在方針政策鬥爭中從一個失敗走另一個失敗的原因。如在經濟政策方面，他不顧托洛茨基的批評和建議，頑固地推行他和布哈林自命為正確、穩健的、能確保「工農結合」的「新經濟政策」，對托洛茨基對工業嚴重滯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導致經濟危機，破壞工農結合的警告置若罔聞，甚至採取行政措施強行壓縮消費者的需求，最後終於在糧食收購危機的沉重的打擊下，被迫徹底拋棄他推行了多年的經濟政策。在國際政策方面，這類的例子更多。在中國革命、英俄委員會等問題上，在革命高潮時，他拒不同意採取托洛茨基讓中共退出國民黨，發動工農群眾建立蘇維埃的主張，在後者的警告聲中，一步步地把中國革命和英國總罷工引向災難的深淵；而在革命已經失敗之後，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又以極左的冒險主義使革命力量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斯大林受夠了右傾政策的苦頭之後，從1928年開始，在國內外政策上都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尤其是他的資本主義即將滅亡，全世界已經進入革命高潮的「第三階段」理論，直接導致納粹在德國上台，使人類遭受空前浩劫。在這個理論中，他提出了「社會法西斯¹²」概念，命令德國共產黨集中全力打擊社會民主黨，絕對不能與它建立任何形式的統一戰線。托洛茨基與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力主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它們的共同敵人——納粹黨。¹³在納粹上台前那幾年中，他竭盡全力對共產國際、德國共產黨敲響警鐘，在德國形勢發展的每一個轉捩點上為他們指出正確的策略路線，但那些領袖們不僅不聽他那些睿智的分析和建議，還對他百般嘲笑。

客觀地說，如果講的是不同的觀點、方針政策的鬥爭的話，鼠目寸光的官僚經驗主義者斯大

林根本不是高瞻遠矚、雄才大略的革命理論家、戰略家、策略家托洛茨基的對手。這就解釋了為甚麼斯大林從鬥爭伊始就借助不正當手段，如無原則勾結、拉幫結派、造謠誣陷、耍陰謀、使用流氓手段，動用組織措施、國家鎮壓機器進行黨內思想鬥爭，把黨內思想、觀點、政策、方針的鬥爭戰場變成血腥的屠宰場。這本身就證明了他思想上的軟弱。還有一個更好的證明。30年代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驅逐到遙遠的墨西哥，他幾乎是孤身一人進行反對斯大林的內政外交政策以及國際資本主義的鬥爭，他組織的第四國際還未成氣候，無法與斯大林領導的第三國際抗衡。儘管如此，斯大林還是不能釋然，多次派刺客暗殺托洛茨基，直到後者慘死於特務的冰斧之下。流亡者托洛茨基除了思想之外，是不會對作為蘇聯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的獨裁者斯大林構成任何威脅的。那麼斯大林為甚麼還要怕他，必欲除之而後快，這恐怕只能從托洛茨基的思想、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年的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和他對斯大林昏庸的政策之犀利批判中找答案了。這也證明了一個真理，寬容只是勝利的強者的品格，在以卑鄙手段獲勝的弱者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杜應國先生對這兩個人的界定，其實只適用於斯大林一個人。他才是為奪取權力不擇手段的人，為了把列寧領導的生機勃勃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改造成惟他的馬首是瞻的馴服工具，他不惜把列寧時期的老布爾什維克殺光。這些手段保證他戰勝了所有反對派（當然是在無原則、無遠見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的配合之下，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他們和斯大林勾結起來，為戰勝托洛茨基破壞黨內民主，最後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獨裁祭壇上的犧牲），保證了他二十至三十年的獨裁統治，卻保證不了他準確地判斷形勢，預見它的發展趨勢並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決策的能力，即真正的領袖的能力。

筆者譯完美國開拓者出版社出版的《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1928）三卷本中的頭兩卷。1923—1927年黨內鬥爭最激烈的五年中，托洛茨基所寫的文章和書信大部分收入其中，已經收入專集的有關中國革命問題和英俄總委員會問題的文章除外。他的文章和書信涉及的都是經濟政策、黨內制度、外交政策等問題。文章不是籠統地否定多數派（先是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加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斯大林破裂後，則是斯大林與布哈林的中右派聯盟）的政策，而且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指出對方的錯誤，闡明自己的觀點，還為對方指出糾正錯誤的方法和正確途徑，預見對方的錯誤將導致的後果。他對多數派的批評確實是建設性的批評。由於多數派對他的睿智透徹的分析和勸告只是一味謾罵，固執己見，並狂妄地稱他們的政策是惟一理智和正確的政策時，托洛茨基的文章中也不乏激憤之詞，但其主旨是維護十月革命的成果，對黨和國家所面臨的錯誤政策將導致的惡果大聲疾呼，敲響警鐘。直至他被開除出黨，流放到阿拉木圖，乃至被驅逐出國，他仍認為自己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員，他與斯大林的鬥爭是黨內鬥爭，國際左派反對派是共產國際中的一派，為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內進行改革，糾正當權的多數派的錯誤路線而鬥爭。因而，他堅決反對另立新黨、建立新國際的主張，甚至不惜與堅持這些主張的人分道揚鑣。1933年，在斯大林的錯誤的「第三階段」理論的指導下，德國共產黨不發一槍就讓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才決定與第三國際決裂，著手建立第四國際。

如果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鬥爭真像作者所說的那樣是性格、稟賦的不同，是權力欲和野心之爭的話，值得兜這麼大的圈子嗎？其實，除了作者指出所謂托洛茨基錯失奪權良機之外，他還有更簡單可靠的辦法：即發動軍事政變。他是軍事人民委員，在軍隊享有崇高的威望。蘇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安東諾夫-奧弗申柯1923年12月27日致俄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和政治局的一封信表達了軍隊對中央多數派詆毀托洛茨基的憤慨，他在信中說，當多數派為在軍隊中破壞托洛茨基的威信，派代表在軍人黨員會議上誣衊他是孟什維克、分裂黨、是政治上的破產者時，與會的官兵義憤填膺地高呼：「托洛茨基萬歲！報告人滾下

去！」軍人黨員中許多人提議，大家必須萬眾一心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¹⁴。僅僅是為了奪取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發動軍事政變，又有列寧罷免斯大林總書記的遺囑的尚方寶劍，應該說是沒有問題的。但對利用列寧提供的炸彈去奪取政治鬥爭的勝利，或利用軍事政變來達到這個目的，托洛茨基本人是怎麼考慮的呢？他說：「當時，能全部了解反對機關權勢分子、官僚主義分子的『列寧－托洛茨基聯盟計畫』的只有我和列寧兩人，政治局其他成員只有些模糊的猜測而已。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遺囑，誰也不了解¹⁵。我的出擊很容易使人理解為，更確切地說，是被描繪成我個人爭奪列寧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的鬥爭。我一想到這點就膽戰心驚。我認為，這將使我們的隊伍軍心渙散，即便獲勝也將付出沉重的代價。」¹⁶「我盡可能長期地避免介入這場鬥爭，因為其性質是一場非法陰謀活動，至少在開始階段是旨在反對我個人的。這樣的鬥爭一旦爆發，在革命專政的條件下必將會採取極端尖銳的形式，會導致致命危險的後果。這對我來說，是十分清楚的。以極大的個人讓步為代價試圖保持集體工作的共同基礎，還是我進行全線進攻，雖然沒有這種行動的必須的政治基礎……有導致陷入絕境的勝利，也有開啟新的未來的失敗。」¹⁷這是目光遠大的政治家，還是不顧一切地奪取權力的野心家，讀者自己判斷吧。

為奪取政權而調動軍隊，作為政治家的托洛茨基是根本不會考慮的。他在自傳中寫道：「列寧臥病之後，當追隨者的觸角伸進軍事部門時，我力求避免有關黨內分歧的話題，尤其是同軍事部門工作人員談話。局勢很不明朗，分歧已初露端倪，在軍隊中拉幫結派蘊藏著極大的危險。」¹⁸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軍事人民委員的職務，他「毫不反抗，甚至懷著寬慰的心情交出了我的軍事職務，因為這樣可以奪去敵人散布我搞軍事陰謀等流言蜚語的口實」¹⁹。

三 杜應國先生文章中的知識性錯誤

除了上述分析、判斷性的偏頗和錯誤外，杜應國先生的文章中還有一些知識性的錯誤。這裏僅談最重要的兩處。一是作者斷言，托洛茨基與其他政治局委員共同決定封殺列寧罷免斯大林的遺囑。這大概是因為作者只看到托洛茨基在其自傳中對加米涅夫講的那段話。那是在列寧已經準備與斯大林攤牌，作為「三駕馬車」成員的加米涅夫已經亂了方寸，托洛茨基對他闡述了自己對局勢的看法：「請你記住並轉告他人，我根本無意為改組而在代表大會上掀起鬥爭。我主張維持現狀……我反對清除斯大林。」²⁰或是他還記住了伊薩克·多伊徹在《被解除武裝的先知》中對托洛茨基在黨內鬥爭早期的消極狀態的描述。他沒有看到1923年4月18日《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對季諾維也夫關於公布「列寧遺囑」建議的意見彙編》。在這份標著「絕密」字樣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與會的其他人的意見分別如下：

1、我認為，這篇文章應該公布，如果沒有妨礙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話。

在公布（在公布的情況下）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論合作社》、《論蘇漢諾夫》）是否要有些區別。

托洛茨基

2、不能公布：這是沒有講的政治局講話。僅此而已。文章的基礎和內容是個人鑒定。

加米涅夫

3、娜·康·（克魯普斯卡婭）也持這種看法，只應該轉交給中央委員會。關於公布的問題我

沒有問，因為我當時認為（現在仍認為）這個問題不存在。可以提出這個問題。在公布的情況下就沒有區別。只是這份記錄（《論國家計劃委員會》）稍晚些時候轉交給我——在幾天前。

季諾維也夫

4、我認為沒有刊登的必要性，況且沒有得到伊裏奇對公布文章的批准。

斯大林

5、而季諾維也夫的建議只是讓中央委員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為從對廣大群眾的公布中誰也不會搞清任何東西。

托姆斯基

6、弗·伊·的意見不是寫給廣大群眾的，而是給中央委員會的，所以把這麼多篇幅用於個人鑒定。論合作社的文章就與之不同。不應該發表。

索爾茲

7、布哈林同志、魯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同意季諾維也夫的建議。

斯洛瓦廷斯卡婭²¹

筆者之所以把這份文件全部翻譯過來，除了證明托洛茨基沒有與其他政治局委員共同封殺列寧遺囑，還為了讓讀者了解當時托洛茨基在黨的上層領導中多麼孤立，簡直是孤掌難鳴。其實，1996年出版的鄭異凡的《天鵝之歌》摘引過這份文件，也就是說，這份文件的中譯文並不是在本文中首次披露。

另一個知識性的錯誤是作者武斷地說，托洛茨基贊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集體化。不知作者根據甚麼資料得出的這個結論，不知是不是根據國際學界的共識。我記得《先知三部曲》中明確地說，托洛茨基反對消滅富農，集體化只有建立在相應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效果。他主張在國家工業的支援下，為集體農莊提供拖拉機、汽車等農機具，在國家工業不能為農村提供全部所需的農機具的情況下，只能搞試點，顯示出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優越性，隨著工業的發展，逐步實現農業集體化。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中派政策（經濟政策也包括在內）定性為左右搖擺政策，他要求左派反對派對它的哪怕是向左的搖擺，也採取有批判的支持的態度。當斯大林向左轉，許多反對派成員因此向他投降時，托洛茨基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杜應國先生大概會說，伊薩克·多伊徹是「狂熱的託派分子」，他的話不足為憑。那就來聽聽托洛茨基本人當初是怎麼說的。筆者最近正好讀了托洛茨基於1930年2月13日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經濟上的冒險主義及其危險〉²²，從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定性為冒險主義，並斷言它會帶來危險。文章對五年計劃中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做了全面批判，這種充滿了歷史主義的精彩批判，至今讀來仍令人讚歎。為了避免轉述的訛誤，讓讀者更好地領略作者的風采，將整段文字翻譯下來²³：

土地耕作生產集體化要求以一定的技術基礎為前提。集體經濟首先是大型經濟。但是，經濟的合理規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質所決定。雖然把農民的木犁和農民的驚馬聯合起來，不能從中創立大型農業經濟，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漁船製造輪船一樣。農業經濟集體化只能是其機械化的結果。由此得出結論：國家工業化的總規模預先決定了農業

經濟集體化的規模。

但現在，這兩個過程事實上是完全分離的。蘇聯工業的發展無論多麼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後的，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很久。高增長係數是對總體低水準而言的。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工業即使在完成擬定計劃的情況下，在五年計劃末，頂多能為20—25%的農業經濟提供拖拉機和所需要的農機具。這是集體化的實際限制。由於蘇聯仍是孤立的，農業經濟的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等）只能在連續幾個五年計劃的前景中來考慮。

十分清楚，今天的集體化的速度不是由生產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決定的，……農民是小商品生產者，它本身沒有市場是無法生存的。消滅新經濟政策使中農——商品生產者面臨抉擇：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費經濟，即走向滅亡，或是為市場而展開內戰，或是在集體經濟的新路上碰運氣。

這段引文不僅駁斥了斯大林的集體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說法，也駁斥了他消滅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張。

至於消滅富農，托洛茨基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在實踐中，消滅富農導致用純行政的方式消滅富農：沒收財產，剝奪土地，最後把他們流放。這項政策是如此貫徹，好像富農在與農村的關係上完全是異物，就像是來自異體的肝臟或是波洛優齊人。²⁴事實上，富農只是中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重點號是本文作者加的——施）。單獨消滅每一個富農，在兩位民警（全副武裝的）的幫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農的產生，哪怕是在集體農莊內部，要困難得多。為此需要的是工業和文化革命。²⁵

反對派從未提倡過「在短期內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世界。我們要求加快工業化，是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保證城市對農村的領導角色。

我們對工業化的可能性的評價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廣泛和大膽得多。但我們從不認為，工業化的資源是無窮盡的，它的速度只取決於官僚的鞭子。我們永遠把系統地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作為工業化的主要條件。我們永遠讓集體化取決於工業化。我們總是把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放在幾十年的遠景中考慮的。……因此，我們從未要求在斯大林—克里日紜諾夫斯基的五年計劃的框框內消滅階級。我們要求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為工業化而有計劃地削減富農的積累。²⁶

這些引言足矣駁斥杜應國先生對托洛茨基贊成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集體化的論斷了。看來，杜應國先生在撰寫〈關於托洛茨基及其評價問題〉之前，還應該再多讀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再多了解一下當年黨內鬥爭的歷史。另外我還想到，如果領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是托洛茨基的話，他關於集體化、工業化的睿智論述大概可以讓我國人民避免「大躍進」的災難吧。

杜應國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肯定是沒有讀過這篇文章。這也不能全怪他。除了上述歷史政治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托洛茨基著作的數量太大。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蘇聯和世界的重大事件、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問題都在他的視野之中，他幾乎對所有問題都能說出獨到的見解，對形勢的分析清晰透徹，對發展趨勢的判斷、預見的準確率極高。讀過托洛茨基對3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分析和判斷的西方學者認為，他這些方面的著作堪

稱經典。我在此提西方學者，並非拿他們來壓人，因為國內學者很少有人讀過這些著作，至少在所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看不出來。但杜應國先生不該把他的管窺蠡測之見當成客觀的歷史結論，甚至戴上一頂「國際學界公論」的嚇人的大帽子。

也許有人會說，在論戰中，尤其在攻擊對手時，誰都會把自己裝扮得公允、不偏不倚，來加重自己對對方的指責的份量。說漂亮話，批評別人誰不會啊。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歸批評，他若大權在握的話，這麼左的人，能比斯大林好到哪兒去啊。

集體化只能建立在農業技術發展的基礎上，這是托洛茨基的一貫思想。早在1922年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就表達過類似的思想；寫於1925年11月、於1926年9月在《真理報》上連載的長文〈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中，他明確地說：「土地國有化的全部意義只能在高速發展的農業技術和由此產生的土地耕作集體化——即許多年以後的前景——的後果中表現出來。」²⁷

說托洛茨基「左」，這是對他的又一個普遍的誤解。雖然托洛茨基領導的反對派稱為左派反對派，這是相對於以斯大林為首的中派和布哈林領導的右派而言的。而且，不能把中派理解為不偏不倚的中庸的派別，更不能把它看成像斯大林自我標榜的那樣是既不左也不右的永遠正確的派別。按托洛茨基的理解，左派是革命派（對那些把革命與極左、左與極左混為一談的人來說，這種區別當然沒有任何意義），它的立場和方針政策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的正確立場和方針政策；右派的立場和方針政策是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向國內外資產階級投降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和方針政策；而中派是沒有自己的立場和方針政策的經驗主義的官僚，它在左右兩派和國內外形勢的壓力下採取左右搖擺的政策。而且，由於斯大林不僅不聽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批評，反而在爭論伊始就把他們的批評和建議上綱上線，定性為孟什維主義、反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並自吹自擂，說他們所推行的政策是惟一正確的。這樣，就使他沒有迴旋的餘地。另外，他是鼠目寸光的官僚經驗主義者，不是理論家，因而他沒有理論預見能力，再加上他的剛愎自用的性格和為爭奪權力不擇手段，把他的每次搖擺（無論向左還是向右）都變成災難之後，再開始新的搖擺，給黨、國家、經濟、政治和共產國際造成劇烈的震盪。對斯大林政策的這一特點，托洛茨基作了形象的比喻，說他像在婚禮上哭喪，在葬禮上賀喜，因而處處挨打的俄國民間故事中的傻子伊萬一樣。在高瞻遠矚、雄才大略、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托洛茨基與鼠目寸光的經驗主義者、「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之間劃等號，只能是曲解、偏見和無知的結果。

四 今天還有多少人對托洛茨基感興趣

杜應國先生對今天還對托洛茨基感興趣的人居高臨下，簡直就像成年人看小孩胡鬧一樣。這大概又是作者的一個想當然。除杜建國外，對托洛茨基感興趣的還大有人在。在google搜索網上，無論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打上托洛茨基的名字，都可以找到上萬項的相關資訊。前些時候，筆者在網上還看到有人要求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將它存放的托洛茨基檔案全部上網，因為它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就個人著作來說，能在網上查到托洛茨基俄文原文著作和英譯本，大概還是古往今來的作家中最多的，雖然這遠不是他的著作的全部。

沃爾科戈諾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書中說，1989年他應邀參加法蘭克福書展時，在大廳入口處，看到一張堆滿了印著第四國際領袖托洛茨基大幅肖像的託派出版物的長桌，那些推銷自己的小冊子和雜誌的年輕人鄭重地說，他們代表托洛茨基同志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黨德國支部。當然，他的感覺應該與杜應國先生一樣，因為他斷定，第四國際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宗派組織²⁸。

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在西方世界一直沒有停止。70年代中期，他的著作的英譯文已經出齊，他檔案中的保密部分除外，因托洛茨基在把他的檔案賣給哈佛大學時，規定這些檔案到1985年解密。

蘇聯時代，托洛茨基著作一直是禁書。直到戈巴契夫改革後期，他的著作才能在蘇聯公開出版。筆者1990—1991年間在蘇聯時，只看到兩本托洛茨基著作，一本是《文學與革命》，另一本是《斯大林傳》，還有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檔案》。整個90年代，俄國總共出版了十五種托洛茨基著作，其中包括俄裔美籍人費利施京斯基根據哈佛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托洛茨基檔案編的四卷本的《蘇聯共產黨反對派》，後來又出版了 П и с ь м а и з С с ы л к и (《流放地來信》) А р х и в Т р о ц к о г о [《托洛茨基檔案》(三卷四冊)。去年，我托在俄國的朋友幫我購買這些書，他告訴我早已脫銷。看來，研究托洛茨基著作的人還是有的，儘管斯大林及其繼承人對托洛茨基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誣陷。我在網上看到，托洛茨基研究所於1991年在莫斯科成立，而且至今一直有活動。

特別值得介紹一下的是，俄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社會學家瓦迪姆·羅高文 (В а д и м Р о г о в и н, 1937—1998)，他傾其一生最後十五年的時光，寫下了七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種選擇》。此書描述了從1923年左派反對派形成到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身亡這段時間，托洛茨基和他領導的反對派為捍衛十月革命與斯大林集團進行的政治鬥爭的歷史。以一個學者最成熟、最寶貴的十五年時間研究撰寫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鬥爭，並明確地說托洛茨基是社會主義道路的真正代表，不知杜應國先生看了會作何感想。厚厚的七卷書和十五年的時光，這不是杜建國的一篇文章可以比的。居然還有人下更大的力氣，不僅為托洛茨基翻案，還要重新闡釋社會主義，把托洛茨基立為正統！就像著名的中國託派鄭超麟堅持的一樣：馬恩列托！

我想，這是包括杜建國在內的大部分托洛茨基研究者的目的。正是因為他們認識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是十月革命的失敗，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斯大林主義的失敗，他們不願意走「告別革命、私有化的人間正道」，為了解決當前和未來人類面臨的危機，他們不畏艱難地挖掘被斯大林的血腥鎮壓、封殺、誹謗、歪曲所掩蓋的歷史真相，在托洛茨基開拓的崎嶇道路上奮力攀登，不顧他人的嘲諷和冷眼。人各有志，杜應國先生大可不必奇怪。

註釋

- 1 Д. Волкогнов Троцкий издана Новостями Москва 1992—Г С Т Р.18.
- 2 《誤讀的歷史，破產的經濟模式》，載《視界》第14期第192—207頁；《紅鬮鼠》2005年第3期第77—88頁。
- 3 《列寧全集》第42卷第325頁。
- 4 《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第405—406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 5 同上，第406頁。

- 6 同上，第405頁。
- 7 參見羅·亞·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頁。
- 8 參見《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有關文章和注釋；莫西·萊文《列寧的最後鬥爭》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拙文《神話與事實——列寧晚年與史達林的關係》，載《俄羅斯文藝》2001年第二期第73-78頁。
- 9 參見《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第417-418頁。
- 10 參見《史達林研究》1993年第二輯第1—16頁。
- 11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1998年第四輯第221—223頁。
- 12 根據「第三階段」理論，社會民主黨是法西斯政黨，但由於它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更有欺騙性，因此它是共產黨的最主要的敵人。
- 13 參見《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中的相關章節。
- 14 《馬恩列斯研究》1999年第1輯第199-200頁。
- 15 史達林收買了列寧秘書組組長福季耶娃，列寧遺囑的拷貝當時就交給了史達林以及幾個政治局委員，甚至還有一些中央委員。參見鄭異凡《天鵝之歌》第12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16 《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第420頁。
- 17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29] pp.42-43.
- 18 《托洛茨基自傳》第447頁。
- 19 同上，第447頁。
- 20 同上，第424頁。
- 21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 (1923-1927) ТОМ I С Т Р .56.另參見《天鵝之歌》第125頁。
- 22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 Т Р .1-8, Published by Monad Press 1973.
- 23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 Т Р .3-4
- 24 波洛優齊人是十一至十三世紀歐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
- 25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 Т Р .4.
- 26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 Т Р .6.
- 27 Л.ТРОЦКИЙ: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ИЛИ К КАПИТАЛИЗМУ С Т Р .20, ИЗД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1926 Г..
- 28 Д.ВОЛКОГНОВ ТРОЦКИЙ КНИГА 2 , С Т Р .176, ИЗДАНА НОВОСТЯМИ ,МОСКВА 1992 Г..